



红色之旅⑤

浙南红军名将雷高升

工运领袖，曾任瑞安县委书记 英勇顽强威震敌胆

■记者 杨微微

从山脚出发，沿着蜿蜒的山路从山下驱车前往马屿镇后坪村（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前为大南乡后坪村），沿着后坪村的山路，车子绕过一段石子路后，一直开到山顶。雷高升烈士纪念馆就坐落于此。

三层楼的纪念馆，飞檐斗拱，朴素而庄重，面向远方，仿佛在向后人讲述这位出生于后坪村，后来成为浙南地区早期党员、工运领袖、红十三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雷高升的生平事迹。



工运领袖，曾任瑞安县委书记

记者一行来到雷高升烈士纪念馆时，雷高升的小儿子施礼高、孙子施端敬已在纪念馆等候。

后坪村党支部书记施端敬（雷高升之孙）说，纪念馆所在地叫四亩田山，纪念馆从2007年11月12日开始动工，大南乡政府十分重视，许多单位、社会人士、村民热心捐助，有能力捐款的村民就来帮忙干活。2010年6月29日，纪念馆落成，总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561平方米。

雷高升的铜像就树立在一楼大厅，铜像上刻着他出生和牺牲的时间：1901—1932年。

雷高升，原名施德彰，乳名式汉，曾化名雷震、雷冷霜、彭志华、彭德等。

红十三军成立，任红一团团长

“红十三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活动在浙南地区的一支红军队伍，是被中央军委编入正式序列的14支红军部队之一，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跟全国的革命斗争是同步的。”周兴杞说，虽然红十三军仅存在短短的两年时间，但是给浙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以沉重的打击。

1928年的三县农民武装联合暴动虽然失败了，但平阳、瑞安、永嘉等地都有一些革命武装留下来，浙南地

在纪念馆二楼，有雷高升的事迹介绍。“倡导温州工人运动（1924—1926）”、“参加武装暴动（1927—1928）”、“开展游击战争（1929）”、“红军名将的战斗历程（1930）”、“岩头事件（1930—1931）”、“被捕牺牲（1932）”，六大部分串起了雷高升各个时期的主要事迹和历史意义。

“我父亲最早是在温州参加革命。当时他在温州一家布厂里做工，有党员在厂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开展工人运动，我父亲积极参加，是厂里工运的骨干。后来他发起组织永嘉染织业工会，组织各染织厂工人联合罢工。这次罢工胜利后，我父亲就被推选为永嘉县总工会主席。”在雷高升铜像前，80岁高龄的施礼高老人向

记者讲起了父亲早期在温州时的革命经历。

施礼高是雷高升的遗腹子，从小听祖辈们讲起父亲那短暂而又英勇的一生。

据原党史办主任周兴杞介绍，1927年“4·12”事变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温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雷高升携妻儿离开温州，撤到了瑞安，先后隐藏于瑞安驮山、后岸等地。他改名雷高升，便始于此。

后来，他回到了老家，以教书为掩护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，发展党组织。1928年，雷高升参与了三县农民武装联合暴动。

1929年6月，雷高升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。为贯彻中央特派员徐英关

于加紧建立农民武装、进行暴动的指示，他在瑞安仙岩渔潭村召开了各区党组织的负责人会议，决定建立游击队，开展游击战，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政府。9月15日，雷高升带领十余名武装队员，袭击了国民党革藤上望盐务所，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和银元。

“那时候，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我父亲是干革命工作的，我们一家人经常要东躲西藏，或者在亲戚家避几天。国民党就拆掉、捣毁我家的房子，我家以前有7间房，被捣毁只剩下2间。我爷爷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，夹手指，受刑非常苦。大哥这里逃那里逃，二哥8岁的时候，被抓去吓怕了，吓哑了，说不出话来。”讲起当年一家人遭受的苦难，施礼高有些激动。

被捕牺牲 红十三军 斗争失败

红十三军成立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里，各部连续发动攻打国民党的中心城镇，打平阳、夺李茅、克缙云、袭丽水、占乌岩等，经历大小战斗近百次，范围覆盖浙南十几个县。

但是红十三军受到当时党中央“左”倾错误思想的指导，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，连续攻打县城和集镇，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。同时，在开展频繁的武装斗争中，没能在游击中心区发动群众，开展土地革命，建立根据地，致使军事活动和党组织失去依托和群众的有力支持。

1932年5月，发生永嘉“岩头事件”，雷高升等人英勇牺牲，标志着红十三军斗争最终失败。期间，瑞安党组织、游击队作出了巨大牺牲。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他们武装斗争坚持时间长、范围广，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农村封建势力，还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民党“围剿”中央苏维埃的兵力，为后来红军挺进师的活动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、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，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（文章内容参见《瑞安英烈》、《中共瑞安党史》）

身先士卒，率红一团攻打平阳县城

“我父亲任红一团团长后，主要活动在永嘉一带，听我祖辈们讲起过，我父亲曾带兵攻打过平阳，不过最后失败了。”施礼高对父亲雷高升参加红十三军之后的一些战斗细节并不清楚，加上年事已高，有些忘记了。

红十三军建立之后，根据当时中央的指示，攻打国民党的城市、乡镇作为主要军事行动目标，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平阳。

1930年5月15日，胡公冕、雷高升率领红十三军红一团，及黄岩红军游击队战士等900多人，从永嘉表山出发，突击青田平板式，击溃省保安队两个连，随即进入瑞安，袭击了陶山镇，夺取了陶山警察所全部武器，随后直驱平阳。

5月24日清晨，红一团、瑞安游击队共1600多人分为两队，分别经

山皇、湖岭、塘河和石塘岭、过沙岗到达平阳城下。平阳县委负责人吴信直和叶廷鹏分别率万全、江南的农民武装前往接应。余声斋、冯仁喜、白希钦等率领另一路瑞安西区和北区的游击队200多人，从高楼南山出发，经垟直达平阳。

平阳县城驻有国民党省防军的一个连，还驻有县警备队、保安队等。5月24日上午9时，胡公冕下令部队攻城。红一团和平阳、瑞安的武装队伍，分别从西门、北门进攻县城。守城敌人一时没有防备。从西门攻入的队伍，很快攻下了国民党县警察局和稽查队，后又攻入县府，歼灭部分卫兵，县长叶燕荪越墙逃跑。

从北门攻入的队伍，原定攻打目标是驻在城隍庙内的国民党省防军。由于人地生疏，向导领错了路，将五

显殿错认为城隍庙，扑了空，再转向城隍庙时，已耽误时间，省防军已占领城垣，居高临下，疯狂反扑。驻南门外的国民党巡捕队闻讯赶来增援。

“攻打平阳，开始时战斗比较顺利，从西门攻入的队伍把国民党县长大印也缴了，砸开监狱大门，释放被关押的40多名无辜群众。后来国民党发现农民武装的武器不太好，加上天下着小雨，当时农民武装的武器好多都是土枪，非常简陋，被雨淋后就打不出来。而国民党的武器比较精良。”周兴杞说。

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15时。雨越下越大，红军和游击队用的一些土枪被雨淋后逐渐失去战斗力，而国民党援兵又陆续赶来，红一团和游击队陷入重围之中。为保存实力，胡公冕、雷高升下令部队撤出战斗。

撤退时，许多游击队和红军战士被国民党拦截在城里。“当时有些农民武装是临时跟去的，组织上差一点，城门关了之后，这一部分人被困在城里，如果不及时营救，就会被国民党杀害。这时候，雷高升组织了敢死队，调集枪手，拿了猪肉架上的案板，带头向城内敌人冲锋扫射，以掩护被困游击队和红军战士的突围、撤退，救出了很多农民武装，减少了牺牲。”周兴杞说。

后来，国民党军紧闭城门，挨家挨户搜捕红军战士和游击队。攻打平阳县城最终失败。

这次战斗，红一团、游击队共牺牲192人，其中瑞安籍战士伤亡最大，北区、南区都有数十人伤亡。但这次战斗产生的政治影响很大，《上海报》和苏联《真理报》对此相继作了报道。



雷高升带领十余名武装队员，袭击国民党革藤上望盐务所。